

第一章 東西之間

第一節 殖民書寫

(一)

在論述帝國主義對於東方殖民地的統治時，我們不僅要看到政治與軍事力量，還要看到敘事的力量。敘事是帝國主義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小視。以自己“祖家”的經驗和意象，來命名對於他們來說未知的土地，殖民者可以克服自己的陌生感和恐懼感，延伸自己的帝國經驗。因而，香港才有了大量的以英文命名的街道、建築等。更重要的是，敘事是帝國行為的合法化的工具，藉助於此，帝國主義可以將殖民地納入自己的歷史敘事之中。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曾闡述過帝國主義軍事佔領和敘事運作的關係，“帝國主義發動戰事，自然主要是為了爭奪土地，但是一旦關係到誰擁有某片土地，誰有權在上面居住和幹活，誰建設了它，誰贏得了它，誰策劃了它的未來——這些問題無不在敘事中反映出來，在敘事中展開爭論，甚至曾一度在敘事中見分曉。……敘事產生權力，敘事還可以杜絕其他敘事的形成和出現。這對於文化和帝國主義非常重要，而且構成二者之間的一種主要聯繫”。¹ 敘事的工具是文本，它們都是營造帝國想像不可缺少的媒介。本尼狄克特·安德森認為，文化、國族身分的歷史建構，是想像與敘述的結果，而在這一過程中，印刷媒體是最為重要的手段，故他提出了一個“印刷資本主義”的概念。的確，在電子媒體尚未產生的情況下，英國殖民者的香港敘

1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xiii.

事主要是依賴於印刷媒體如報刊、史書等來完成的。

英國人對於印刷媒體的建立、運營高度重視，佔領香港後，他們幾乎壟斷了所有敘事文本。香港開埠之後，英國人立即創辦了大量的報刊，如 *Hong Kong Gazette* (1841)、*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1842)、*Hong Kong Register* (1843)、*China Mail* (1845)、*Daily Press* (1857)、*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53)、*Hong Kong Telegraph* (1881)，不僅這些英文報刊，如《遐邇貫珍》(1856)等中文報刊也是英國經營的，由華人主辦、可反映華人輿論的中文報刊只有後來孤立的《循環日報》(1873)。至於香港史的領域，可以說完全為英國人所把持，香港的歷史敘事幾乎完全為英國殖民者所壟斷。早在1895年，就有 E.J.Eitel 撰寫的《中國的歐洲》(*Europe in China*) 這樣厚厚一大本香港史的出現，其後出現了大量的西人撰寫的香港史，如 G.R.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G.R.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the Years of Discretion*；Hennessy James, Pope, *Half-Crown Clony: A Historical Profile of Hong Kong*；Endacott, G.B.,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Endacott, G.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等等，中文的香港書寫一直到二十世紀才出現。

英國殖民者在香港敘事中的歷史想像和敘事策略如何呢？本文試圖通過香港史上的報刊、史書、小說等文本對此加以分析。

中國南方的海島香港，原與英國毫無關係，為了合理化英國對於香港的佔領，英國的香港敘事首先改變香港與中國及歐洲的空間關係，確立香港與英國的淵源。出版於1895年的埃特爾(E.J.Eitel)的《中國的歐洲》是第一部編年體的英文香港史。“*Europe in China*”，這一題目非常簡潔地指明作者對於香港的時空位置的處理：香港雖然在地理位置上處於中國，但它本不屬於中國，甚至不屬於亞洲。書中說：



香港從來不是亞洲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它對於中國政治或社會組織並無任何實際意義。它的名字從來就不為中國的地志學家和政治家所知，是西方人給予了它在東方歷史中的命名。它位於中華帝國遙遠的東南端，與英國在非洲、印度和北美的殖民地遙相呼應，組成了英——中自然的太平洋驛站。香港從來不是天然地屬於亞洲或歐洲，按照上帝的神義，它命中注定要成為二者的橋梁。²

自古代起香港地區就一直處在中國政府的行政管轄之內，島上既有居民也有房屋建築，E.J.Eitel 卻言之鑿鑿地說它從不為國人所知。在上述敘事中，按照上帝的安排，香港本來就不屬於亞洲和中國，而是聯繫亞洲和歐洲的通道，天然地構成了與英國在非洲、印度和北美的領地遙相呼應的殖民地。幾乎所有的英文香港史都是這樣敘述的，從英國發現香港開始，以歷屆港督治理香港的政績為章節。香港在英國發現之前的歷史，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抹殺了，它與中國的聯繫也同時被抹殺。

除了構造香港在“本源”、“神意”上就不屬於中國、而與英國相聯之外，英國的香港敘事還要肩負着合理化英國佔領香港這一歷史事件的使命。英國人辦的《遐邇貫珍》第1號有一篇題為“香港紀略”的文章，這篇概略性的文章並不長，卻典型地體現了英國敘事對於鴉片戰爭及英佔香港的敘事邏輯。此處容我作稍長的徵引：

溯前十二載，林文忠奉命到粵，禁絕鴉片。原宜將船煙拿獲，一並入官。但林文忠竟將城外商民，不分青白，及有無販賣鴉片者，一概封鎖，並將在內傭工漢人，均行撤盡，斷給口食，致令各商民，備受艱

難，幾有性命之憂。其中竟有與煙無涉，或屬傳道，或屬行醫，或屬職員，非此則彼。似此不分良歹，豈得為公平之道乎？總因林文忠尚未諳他國事務之故。蓋無人不深悉我國〔按，指英國〕，斷不容無故受屈，致啟後釁，即如我國皇后〔按，指維多利亞女王〕，彼時知良民被害，赫然大怒，即興師旅，蓋欲雪此恨，而杜將來之患也。林文忠等素輕視西邦，不以為勁敵，意以戰船兵丁即來，何難除滅，以了其事。追溯昔時，中國名將奇材甚多；俯視今日，內地猛士異能不乏，以英國不過渺如淵島，豈敵中華幅圓之盛！唯英國屬地，既多且廣；船隻人民，通行於天下，是別國一平民受害，必不肯置之罔聞。況因中華歷來藐視外國，不通交往，以致外國商民，近年迭興美利，中國竟不能稍獲其益，林文忠豈不知之！彼時皇上漸悟其辦理誤謬之處。英兵攻克城池，徑至天津具訴，朝臣允其所請，而船始南旋。迨後又複食言，故更興兵，陸續攻克數處城池，直駛長江，幾陷江寧。其時，英官所討，始皆允肯，軍乃撤退。英國初意非為土地，只為本國之民照常貿易，免受平空之欺藐而已。後因所願不遂，致起兵釁，我國不得已而討取行師軍餉之費，另一小島，以備居息之所，往來商船，得以灣泊屯守，兵士借為住扎。遂擇地於香港，所定文約，即於癸卯五月二十九日，互交收執，此後香港割出中國版圖，永屬英土地矣。³

這段描述可作為新歷史主義關於任何表述都受制於意識形態的邏輯和語言描述的修辭的分析例證。鴉片戰爭和香港割讓，在中國人看來是蒙受帝國強盜侵略的悲劇，在英國人的上述敘事中，它卻成為了一段匡扶正義、報仇雪恨的喜劇故事。在海登·懷特看來，將歷史事件化為特定的故事，取決於敘述者的敘事策略。這些敘事策略包括：“1. ‘精簡’ 手中材料（保留一些事件而排斥另一些事件）；2. 將一些事實‘排擠’至邊緣或背景的地位，

2 E.J.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88.

3 〈香港紀略〉，載《遐邇貫珍》，1853年8月第1號。

同時將其它的移近中心位置；3. 把一些事實看作是原因而其餘的為結果；4. 聚攏一些事實而拆散其餘的，這在於使歷史學家本人的變形處理顯得可信；5. 建立另一個話語即‘第二手詳述’它與原先話語較為顯著的表述層並存，通常表現為對讀者的直接講述，並且通常都向話語的顯現形式提供明確的認知根據（就是說使前者合法化）。”⁴ 鴉片戰爭和香港割讓這一歷史事件，之所以變成了喜劇的故事，正是由於這一些敘事策略所達到的效果。我們可以將鴉片戰爭和香港割讓這一歷史事件的元素，按順序排列如下：

1. 早在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就希望擁有中國一島，方便對華貿易。
2. 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在香港水域大量進行鴉片交易。
3. 清政府的禁煙令，受到英人抵觸。
4. 林則徐禁煙，包圍商館，斷絕供應。
5. 1839年7月，英國水手肇事，中國村民林維喜被殺害。
6. 林則徐禁絕對澳門英人的食品供應，並諭令澳門當局驅逐英人，將英人趕至香港海面。
7. 英方擬進行軍事干涉，交戰前英國外務大臣照會清廷，內中正式提出賠償煙價、割讓島嶼等要求。
8. 戰爭，條約。

這裏，我們能夠看到〈香港紀略〉一文對於歷史史料的加工過程。它忽略了第一項和第七項，隻字不提英國方面因為貿易等原因一直想佔領中國海面的一個島嶼，而在進攻中國之前就已明確提出要割讓中國島嶼的要求，卻竭力瀉染英國在中國受迫害的

4 Hayden White, "Historicism, History, and the Figurative Imagination",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張京媛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192頁。



第四項和第六項。這就使得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得以轉變，原來歷史的順序是：英國人原來就希望擁有中國領土進行貿易，在中國政府禁止鴉片貿易的情況下，英國人就是因為沒有一塊自己的領地而大吃苦頭，因而他們借鴉片戰爭實現了自己的佔領領土及開埠貿易等要求；現在變成了，因為清廷藐視英人，使其在華受到不公正待遇，女皇要報仇雪恥，遂發兵中國，戰勝之後“不得已”要求賠償所耗軍費，順便佔據一個小島。

在此被忽略的事實還有第五項，即中國村民林維喜被殺之事。事實上，此事與林則徐對於英人的治裁很有關係，這後面還牽涉到一個治外法權的問題。林維喜在中國領土被殺，英人卻不服中國管轄，自行在海上設庭審理，這種侵犯中國司法主權的行為令中方憤怒，之後才出現林則徐禁絕對澳門英人的食品供應，並諭令澳門當局驅逐英人，將英人趕至香港海面的事件。〈香港紀略〉根本不提這一事件，將交戰原因完全歸結到禁煙事件之中。

而在對於禁煙事件的敘述中，文章卻又以極為簡略的交待模糊了英方對於禁煙的態度，“林文忠奉命到粵，禁絕鴉片。原擬將船煙拿獲，一併入官。但林文忠竟將城外商民，不分青白，及有無販賣鴉片者，一概封鎖……”，這一敘述給讀者的印象是，英方所責並不在禁煙本身，而是林則徐不分青紅皂白地冤及他人。事實上，英方抗拒的是禁煙本身，因為鴉片交易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英方發動戰爭的直接要求就是要求賠償被林則徐銷毀的鴉片。在軍事壓力下，清廷後來被迫認同英方的這一立場，只好歸罪於林則徐，稱“上年欽差大臣林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當”。⁵

經過這樣的增刪變動，鴉片戰爭及佔領香港的行為就極富邏

5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道光十四年文書，第10號（東京：巖南堂書店，1967）。見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45頁。

輯性地合理化了。而作為專門談論香港的文章，在關鍵所在的香港割讓一事上，卻極為輕描淡寫，它在這裏僅被處理成一個無關緊要的附屬事件。“英國初意非為土地”，只在戰後要求賠償的時候，另附一小島。這一說明，純屬此地無銀三百兩。香港領土及其人民的命運，就被這“另一小島”四個字決定了。

歷史敘述的效果取決於作者的話語框架，它具體是由語言表述的比喻修辭層面構成的。在〈香港紀略〉一文中，有很多對於中國和英國的修辭性描述。對於中國的描繪有：“中華歷來藐視外國，不能交往。”“林文忠等素輕視西邦，不以為勁敵，意以戰船兵丁即來，何難除滅，以了其事。追溯昔時，中國名將奇材甚多；俯視今日，內地猛士異能不乏，以英國不過渺如淵島，豈敵中華幅圓之盛！”對於英國的描述有：“蓋無人不深悉我國，斷不容無故受屈。”“唯英國屬地，既多且廣，船隻人民，通行於天下，是別國一平民受害，必不肯置之罔聞。”中國封閉自大，輕視西邦，而英國卻國力強大，斷不容欺負，這些看似與中心事件無關的敘述，就是此文預設的話語框架，內中詞語的褒貶，構成了鮮明的傾向性。由此，自大挑畔的中國受到匡扶正義的英國的懲罰，這就成了一個皆大歡喜的喜劇。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無意以“中國敘事”糾正“英國敘事”。在此歷史事件中，中國是受害者，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的國族歷史敘事就是“客觀”的。以內地較為權威的《十九世紀的香港》為例，這本書在敘述鴉片戰爭和香港割讓時，完全不提禁煙時林則徐封鎖廣州英人會館，斷絕食水，撤走中國人之事，而這在〈香港紀略〉是敘述的重點，是英國發兵的原因。《十九世紀的香港》中的這一變動，令中國人變得更加無辜，而英人顯得莫名的蠻橫。這樣，我們就讀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英中對於鴉片戰爭和香港割讓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處理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福柯所強調的知識與權力間的關係。

刊載〈香港紀略〉的刊物《遐邇貫珍》是頗值得一說的。《遐邇貫珍》是香港最早的、也是較具影響的中文報刊。據此刊主編理雅各自述：此刊“每月刊刷三千本，遠行各省。故上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下遞工商士庶，靡不樂於披覽”。⁶因為英國人的漢語水平有限，故英國人辦的英文報刊很多而中文報刊寥寥，在此情形下，《遐邇貫珍》就成了宣傳殖民者意識形態，形塑港人西方文化認同的重要陣地。〈香港紀略〉一文對於香港來歷的合理化敘述，便是在港人心目中重新塑造英人的形象，為香港的歷史身分“正本清源”。

分析《遐邇貫珍》，我們能看到英人在敘事中塑造西方認同的努力。其中的一個基本敘述策略是，時時不忘表彰英人的英明，同時貶低中國人為愚昧，從而構成一種對比。

1855年8月號上有一篇禁止賭博的文章，文章在宣揚賭博為害，“大英立法嚴訊，既禁之於前，必不行之於後”之後，接着拿內地進行了對比，“試觀內地賭風盛者，其游民必多，盜賊由此起”。⁷

1855年5月號上有一篇禁止溺死女嬰的文章，文章貶低了《大清律例》的有關條款，以為“父母殺嬰兒一款，律無明文，官無討罰，此國政不彰，民俗澆漓，莫此為甚。”⁸

英人甚至在發表香港糧餉進支時，也不忘記攻擊中國：“以上所錄本港舊年進支糧餉各數，讀者或以為此款無關於致知格物之義，無與於推情度理之端，載列貫珍，甚無為也。余今略說其意，蓋欲以表大英等國常例耳！……嘗聞中國與余為友者，說及官府所取於民，不入國庫者強半；所受以給兵，而不如數以與者

6 理雅各：〈遐邇貫珍告止序〉，載《遐邇貫珍》，1856年6月號。

7 〈賭博為害，本港自當嚴禁論〉，載《遐邇貫珍》，1855年8月號。

8 〈香港人數加多，幼男多于幼女論〉，載《遐邇貫珍》，1855年5月號。

亦然。此言果否，余不敢置議，唯以上所陳大英等國之常例，華夏未有行之，故敢略其概，庶使行政者於修己治人之方，或未必無小補云。”⁹ 敘述者雖說“此言果否，余不敢置議”，但卻不負責任地散佈了國內“官府所取於民，不入國庫者強半；所受以給兵，而不如數以與者亦然”的驚人事實，這是對於中國政府最有效的攻擊。

上面幾篇文章所述中國之腐敗是否事實姑且不論，需指出的是英人敘事都具有選擇性，即以香港的長處對比國內的短處。這種敘事的目的很清楚，是造成港人對於國內的疏離，培養他們對於英方的認同。

在 1855 年 6 月號《遐邇貫珍》上，我發現一篇名為“港內義學廣益論”的短文，頗為有趣，摘錄如下：

近聞香港赤柱等處，竟多有不在義館就學者，詰其所由，乃因其父母不喜其子誦讀耶穌經書，且嫌館內不安文昌帝君云云。夫耶穌之書，始終教人為善去惡，其有益人身心者更大；且為英國所信奉，唐人居住在本港，既屬英憲治下，誦習此書，有何不可？

前面說的《遐邇貫珍》所標榜的香港較之於內地的優越，主要是制度上的，因而它所能喚起的主要是港人對於英人的政治認同，而不是文化認同。作為中華傳統文化傳承者的港人，在文化上仍與英人有巨大的差別。上面這篇小文所寫的就是一件典型的“文化衝突”。本地港人因認同文昌帝的牌位，不喜歡耶穌，故而不去英人的學館上學。英人首先向人們宣傳基督教的“教人為善去惡，其有益人身心”的優點，接着又略帶威脅地說，既居住於

9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香港全島進支糧餉費項〉，載《遐邇貫珍》，1855 年 4 月號。

英國統治地區，為甚麼不能轉而信奉英國的國教基督教呢？

文化認同上的差異，是在短時間內不易改變的。英國人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訴諸於教育的手段。早在兩年前的 1853 年，英國政府指派的教育委員會就在給學校的指令中這樣寫道：

如果任何學生的家長反對孩子閱讀《聖經》，教師應該解釋該書傳授的知識帶來的巨大好處，並且使他們知道，基督教不是外來宗教，並非起源於英國，而是起源於東方，它遍及全世界，是我們共同的聖父——上帝賜予的。¹⁰

基督教雖然在古代起源於中東，但它後來成為了西方的宗教，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大陸毫無關係。上文用了一個基督教“起源於東方”的模糊敘事，進而推論它“遍及全世界”，是耶穌——在這裏他已取代中國的祖先，成為了“我們”共同的聖父——賜於我們的。英人試圖以這種似事而非的敘事，作為教育方針，將其文化觀念灌輸給港人。

熟悉香港歷史的人可能會提出一個疑問，何以二十年代後期港英政府會倡導中文呢？的確，讀者在魯迅的文章中就可以知道，1927 年 6 月 24 日，港督金文泰在“督轅茶會”上親自發表演說，倡導中國國故。如何解釋這一反常的現象呢？

王宏志認為：“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的省港大罷工對港英政府造成沉重的損失，因此，在事件平息後，英廷決定委任深諳中文，熟悉中國和香港情況的金文泰為香港總督，希望能夠避免同類事件出現。金文泰的策略是提倡傳統中國文化，以抗擊新文化運動以來那種比較激烈的國家主義思想，從而使香港年青一代更

10 Lobscheid, *A Few Notices on the Ex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1859), p.21.



願意接受英國的殖民地統治。”¹¹ 這一說法是有見地的。殖民者何以能與殖民地本土舊文化結盟呢？這似乎讓人感到費解。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在《地球上不幸的人們》一書中對於發生在非洲殖民地的此類奇妙現象，曾有過分析。他說，當被殖民者發展出一種新的“戰鬥的文學”時，“殖民主義專家不認識這些新的形式，轉而求教於本土社會的傳統。於是殖民主義者反而成了土著風格的護衛者”。¹²

另外，我們不應忽略的是，金文泰並非僅僅提倡中國國故，他是希望港人在學好西學的同時，也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若以華人而中英文皆能達，此後中英感情必更融洽”。¹³ 這一舉動意味着新的環境中英國殖民政府文化策略的部分調整。對於殖民者來說，最為可怕的是殖民地本土的民族主義。英人在香港培養西方認同的努力，目的就在於抵制這種民族主義。但香港與其他殖民地有很大的不同，它只是中國領土的一小部分，背後還有一個廣大的中國的存在，它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是無法割斷的。當認識到在香港以西方文化完全取代中國文化之不可能以後，英人開始轉而提倡一種“現代的”、“國際化”的世界觀，以此來消解、對抗本土民族主義。從後來香港的“中文教育委員會”（負責審查中小學中國語文和歷史課本）的一份審查報告中（1953），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港英當局這個新的文化策略。

過去，中國的中文教育只會培育出一些無知而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從教育的角度來看，這是不正確的，更不應在香港推行。在這裏，中國學生在熟習自己的語文、文學和歷史後，應該更進一步，以這些知識作

11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10 頁。

12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Grove Pr. Inc, 1968), p.242.

13 魯迅：〈略談香港〉，載《語絲》，第 144 期（1927 年 8 月 13 日）。

基礎，對東西方思想和語文進行比較研究。透過這種研究，香港的學童才能夠成為現代的中國人，既能自覺於自己的文化，同時又能夠有一種開明、平衡而國際化的世界觀。¹⁴

既學習中文，又學習西文，使港人成為具有國際化世界觀的現代中國人，這目標何其美妙，但其開始對於民族主義的畫蛇添足的抨擊，讓我們看到了這些冠冕堂皇的語彙後面的另外的用意。

（二）

較之於歷史敘事，小說是一種虛構文體，但惟其如此，小說較之於歷史敘事更易於凸顯敘述者的想像。

1895 年同時刊行於英國和美國的由 W. Carlton Dawe 撰寫的小說集 *Yellow and White*（《黃與白》），是我所看到的較早期的反映香港的英文小說。

《黃與白》是這部小說集中的第一篇。小說的主人公 Gresham 是一個在香港的白種英國人，有一天他遇到一個中英混血女性，並為其傾倒。在發現她是一個本地中國商人的妻子後，他非常不平，“這個肥胖的中國豬憑甚麼擁有這樣一個美妙的女性？他的黑色的斜眼，充滿了狡詐和自得，他的油膩的黃皮膚，他的沉重鬆馳的喉嚨……他恨不得馬上給他的肥大的肚子重重的一拳才能解氣。”他根本不顧忌這個中國男人，從正門出來後，立即從側門爬上樓去和這個婦人約會。結果 Gresham 與其家人發生了武力衝突，在一輪激烈搏鬥之後，他英勇地突圍而出，最後乘船離開香港。

這是一個英雄救美女的故事，所不同的，是白人英雄從黃種

14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10 頁。



土人手裏拯救混血女性。正如 Gresham 很容易猜測到的，這個混血女人的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中國人，她是被英國父親遺棄後，跟隨母親在香港長大的。這種香港並不少見的現象，本身就是殖民者罪孽的象徵。而在 Gresham 看來，正是這個女性身上的歐洲血液使她變得出色，他甚至擔心，“她身上的歐洲血液是否抵擋得了中國血液。”這種女性被埋沒在骯髒的黃皮膚的中國人之中，太可惜了，因此需要拯救。在敘事者的筆下，這個女性也是渴望被白人拯救的，Gresham 的戰鬥也是在這個混血女性的召喚下完成的。在小說敘事中，格蘭士成了一個俠義的英雄，其行為的正當性是不言自明的，對於本地中國人的傷害則根本毋需考慮——在這裏，皮膚的顏色就是其正當性的根據。

小說集中的另外一篇小說 *Coolies*（《苦力》），描寫的是英國人在香港販賣、鎮壓中國苦力的故事。八百名中國苦力在英國人的押送下，乘船從香港去新加坡。因為苦力們不願意前往而與英軍發生了衝突，最終演變為暴動。敘事者站在英國人種族優越的立場上，描寫英國人機智、勇敢、殘暴地鎮壓苦力，最後將他們繩之以法的經過。

我們可以想像，中國敘事會怎樣敘述這個故事。我們常常會在如《海魂》這類的電影中看到下層的受壓迫者揭竿而起、正義凜然的場面。在英國敘事者的筆下，情形正相反，中國苦力被輕蔑地形容為“最醜陋、最骯髒的賤民”，而暴動的苦力首領被形容為“一個醜陋的獨眼豬”。在敘事者的眼裏，黃種中國人不過是白種人任意支配的賤民，甚至是自由買賣的畜牲。

正如“白與黃”這一題目所昭示的那樣，這部小說集敘述的是白種人與黃種人的衝突。故事的地點在香港及其它亞洲地區，在這裏，白種人本是外來者，但他們卻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種族的面目出現，任意支配着黃種人。充斥於敘事語言的對於黃種人的輕蔑和醜化，反映出早期殖民者強烈的白人種族主義意識。

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對於香港的敘述，影響最大的當屬克萊威爾（James Clavel）的小說。他的兩部寫香港的小說《大班》及《望族》，以英國人史迪克家族從海盜發展為香港商業界巨擘的歷程為線索，表現香港的歷史興衰，氣魄很大。它們在西方流傳甚廣，對於建構西方人心目中的香港形象影響很大。八十年代以後這兩部小說都有了中文譯本：《大班》因被改編成荷里活電影而名噪一時；後者在中國有兩個譯本，一為《香港風雲》，二為《望族》。

與十九世紀相比，二十世紀涉及香港及中國的英國小說在敘事策略上有所變化。不再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和侵略，而成了輸入文明的現代性啟蒙事業。在克萊威爾的小說敘事中，英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了這個東方小島，給中國帶來了文明，帶來了經濟繁榮。因為史迪克公司在危難時刻受到了一個中國人的援救，從此，“完完全全支持香港和中國的貿易”，“使中國成為世界的一分子”，“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這從此成為史迪克公司歷任大班上任時必須發誓遵守的信條。史迪克家族百年來的奮鬥史，在我們看來是無比高尚的，他們不但致力於香港的繁榮，而且致力於整個中國的強大。在小說中，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情節，在第三任大班德克·鄧樂思任職期間，公司冒着極大的風險，在公司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還全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由海盜貿易、發展到武力侵佔香港的英國殖民史，在這裏被輕而易舉敘述成了西方救世主向中國輸入文明，催促新生的壯舉。

小說中，史迪克曾與將要接任的第二任大班史羅伯有一段談話：

“甚麼叫把公司完完全全支持香港？”史羅伯問。

“用它來和中國做貿易，使中國開放，使中國成為世界的一分子。”

“不可能的，”史羅伯說：“這不可能。”

“也許，可是這是‘財富商行’的目標。”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你是說，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高林問。

“對。”

“那太危險，他們會吃掉我們的。”史羅伯說。

“地球上四個人裏就有一個是中國人，你知道嗎？我希望他們也能學習法律和公正。”

“這不可能成功的，你再怎麼做也是徒然。”

“可這是條件，五個月後你做大班，高林再接你的班。”¹⁵

幫助中國人學習法律和公正，使中國走向世界，即使強大以後的中國會“吃掉”他們也在所不惜，英國人的誠意和氣魄在此顯得何其悲壯。但我們同時也看到，史羅伯事實上根本不同意這一信條，史迪克本人也並不相信中國能夠強大。原因何在呢？從上述對話中我們即可以察覺，在他們看來，中國是一個需要他們啟蒙的、沒有文明開化的、低他們一等的民族。在美美幫助史迪克進行了一場海上混戰之後，他們之間曾有一段對話。美美說：“迪克，人是不會變的。”“人是殺人的動物，我們中國人知道大多數人都這樣。”史迪克回答：“跟我們英國學吧！世界在法律下愈來愈有秩序，人愈來愈平等。”這就是作者所設計的中西文化的衝突，這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

英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人到底如何？想要了解這一點，最簡捷的方法莫過於考察小說中的中國人形象。在《大班》中，中國人主要有洋奴買辦和下等人，基本上都是獐頭鼠目、形象猥瑣。唯一可以得到正面描繪的，是可用來作為情婦的東方女人，比如說史迪克的情婦美美，她充滿性感，富於魅力，深得史迪克之寵愛。這一情形驗證了後殖民理論的一個隱喻，即對於西方來說，

15 詹姆士·克萊威爾：《大班》，薛興國譯（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112-113頁。

殖民地東方是一個充滿性魅力而又渴望征服的女性。

我們看到，在小說中美美是史迪克的情婦，這其實是一種主人與奴隸的關係。美美深諳此點，無論她在史迪克面前多麼受寵，她也從來沒有夢想過與主人相同的地位，她在史迪克面前屢屢自稱奴隸，即使主人教導她不是奴隸時，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堅持這一點，拒絕“啟蒙”。在史迪克“啟蒙”美美時，他似乎真的以為自己是自由、平等的化身了，但我們在另外一個地方，卻看到了史迪克無意中泄露出的自己對於中國女人的真實想法。

有一次史迪克年輕的兒子高林向他請教在殖民地香港如何與女人打交道時，史迪克回答：“擁有你自己的女人，在這裏是很平常的事。那是你個人的事，你擁有她，替她付帳，供給她食物和衣服，給她傭人等等。等你不要她了，你只要給一點錢，就可以叫她走路。”年輕的高林對於男女關係還處於理想的階段，認為這種做法未免過於殘酷，而且像是奴隸買賣，史迪克回答：“假如你認為她是奴隸，你就把她當女奴看待吧，都是一樣的。”

看來美美其實是聰明的，她知道自己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接受，她甚至比史迪克本人還要清楚他內心的想法。殖民地的土人是應該被啟蒙的，但殖民者從來也沒有想過將他們啟蒙到與自己同等的地位。在這一方面，歷史上的海地人就顯得過於天真了，在法國大革命後不久，這個法屬殖民地在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鼓舞下舉行了要求自由獨立的反殖大起義，結果轉眼之間就被法國人鎮壓在血泊之中。

對於英國殖民者來說，文明的啟蒙只是一種神話，他們在內心從來都只將殖民地人看作奴隸。小說中，史迪克號稱要教會中國人法律、公正與秩序，但歷史事實是，作為政治自由主義故鄉的英國，在香港卻不屑於應用其民主制度。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對付奴隸的鞭刑，在香港一直沿用到了上世紀上半葉。1927年，魯迅先生曾在香港《循環日報》上發現中國人受到英國警察鞭答



的記錄，感到十分震驚。

值得一說的是，《大班》後來被荷里活改編拍攝成了電影，而美美這一角色由出走美國的原大陸著名女演員陳沖出演。小說中對於華人／英國形象的黑白分明的對比，在電影中並沒有得到改變，對於中國人的醜化，反倒因為陳沖在電影中裸露身體諂媚殖民者的鏡頭而變得格外突出，這一點後來引起了國內外華人世界的強烈抗議，此影片後來在內地也沒能得到公演。細辨起來，小說或影片中的人物僅僅是港人，而非內地人，事實是，殖民統治下的港人凸顯了中國人在西方世界的境遇。

上面我們談到的，是英國主流敘事或者說國族敘事的殖民想像。對於殖民文本的帝國意識的分析，現在已經成為了後殖民批評的操作思路。但在這裏，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在這種大敘事之外，仍然有另外的聲音存在。在英國文學中，我特別想提到的是毛姆。在毛姆的時代，英國描寫殖民地題材最顯赫的作家是吉卜林和康拉德，他們的小說現在已經成為後殖民批評的批評對象，但同時代的毛姆卻並沒有受到這些經典作家的影響。毛姆看待海外殖民統治者的眼光，與他們並不一樣。

《彩色的面紗》是毛姆完成於1924年的一部香港題材的長篇小說，書中的一個角色是名為查爾斯·湯森的香港總督助理，此人既貪婪又自私，在勾引了女主角凱蒂之後，唯恐連累自己的前程，又一腳將她踢開。他的目標是香港總督這個“肥缺”，別人的死活全不在他的話下。書中的故事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它後來曾受到小說同名人物的指控，還受到香港政府的誹謗起訴，毛姆後來被迫對地名人名作了修改。這部小說開始同時在倫敦和紐約的兩家雜誌上連載，單行本面世後，在兩國很受歡迎，銷量頗高。

毛姆對於殖民統治者的自負愚蠢及其文化意識上的矛盾，有着較為清醒的認識。毛姆在文中曾提到，他在中國遇見過一位

上篇
歷史想像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在英國上流社會出入的“社會主義者”，這位“社會主義者”在購買羅素的《中國之路》的路上，卻隨意打罵中國的車夫，並對毛姆說：“你不必對中國人有任何關心，你明白，我們之所以在這裏就是因為他們懼怕我們，我們是統治的民族。”“中國人總是須要有他們的主人，而他們也總願意如此。”¹⁶ 這一諷刺入木三分，出自於英國作家之手尤為不易。毛姆也曾有一篇名為《大班》的小說，寫的也是英國洋行大班在中國的生活。這位大班也是在中國發的跡，他原來在英國住在巴尼斯鎮郊區寒酸的房子裏，現在卻住在豪華的大廈中；原來他們全家只吃簡陋的冷肉、麵包，現在的派頭卻已今非昔比，每次吃飯時總要三個僕人侍候，湯、魚類、甜食應有盡有。他深以自己是個英國人而驕傲，而英國人的價值只在海外才能得到充分體現，因而他已經不打算再回英國了，即使退休之後。但在小說中，這位大班並沒有克萊威爾小說中大班的英雄豪氣，而對於異邦中國的“苦力”有着莫名的恐懼。他由此而產生了幻覺，並最終驚嚇而死。這篇小說的獨特意義在於，它揭示了大英帝國強盛的殖民統治之下的虛弱。

從吉卜林、康拉德，直至二十世紀後半期的克萊威爾，帝國的幻覺一直長盛不衰。毛姆卻沒有為這種幻覺所欺騙，他既表現了英國海外殖民者的醜惡，又深刻地揭示了他們隱藏於內心的恐懼。就此而言，他在英國文學史上是獨特的。奇怪的是，如薩義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博埃姆的《殖民與後殖民文學》等以後殖民視野重新解讀英文文學經典的著名理論著作，都只談吉卜林、康拉德，以至狄更斯、奧斯丁，卻沒有涉及到毛姆。不知是否因為毛姆並非一流作家，或者還是流行作家，因而不值一提。毛姆筆下的香港形象，與從前殖民敘事的肆意貶低並不一樣。受到西方意識的影響，凱蒂以前對於中國人的印象是“腐敗、骯

16 毛姆：《在中國的屏風上·漢德生》（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60頁。

髒，壞到難以形容的地步。”來到香港後，她發現這並不是事實，相反，中國人神秘莫測、充滿了魅力。她在被查爾斯·湯森拋棄後，極為傷心，不知所措，但她在沃爾頓的中國妻子身上發現了她“正在尋找的東西”。對於中國頗有體會的沃爾頓，從“道”的方面對凱蒂宣講中國的神秘，“凱蒂從這兒窺探到一個色彩豐富、含義深刻的世界”。但對這些玄而又玄的東西，凱蒂感到很難理解，沃爾頓自己也覺得高深莫測。凱蒂問：“這種說法對嗎？”沃爾頓回答：“有時候，五六杯威士忌下肚，我仰望星空時，覺得這種說法可能是對的。”¹⁷

毛姆對於中國人的讚揚可能會使國人感到高興，但這種“崇敬”卻是有點可疑的，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毛姆的讚揚來自於異國情調的東方神秘，這事實上是自居為主體的西方意識的他性構造。這裏的讚揚與前面所說的貶低一樣，同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物。就此而言，毛姆與其他作家一樣，在敘述東方時都未能擺脫殖民意識，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第二節 現代性與殖民性

弗里德里克·傑姆遜（Fredric Jameson）認為，由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第三世界受壓迫國家唯一可選擇的反應必然是民族主義的，因而文學的敘述方式只能是“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式的。¹⁸這一說法受到了艾捷茲·阿赫默德（Aijaz Ahmad）的質疑，他提出一個例外的情形：當資本主義關

係在殖民地成為一種“內在的構成性力量”時，必然會出現利比多經驗的個性化，“隨之而來的是個體體驗作為一種孤獨的、異化的實體，不能與任何的集體性發生真實的、有機的聯繫”。這種“現代性”文本就不是傑姆遜所謂“民族寓言”式的，而“具有資本主義時代第一世界的特徵”。¹⁹這篇題為“傑姆遜的他者修辭和民族寓言”的文章從幾個方面對於傑姆遜的反詰頗為有力，以致於有中國論者發出感慨：“傑姆遜的這篇文章在九十年代初已有中譯本，在中國發生了廣泛的影響，相當多的學者是把它當作後殖民主義的經典來閱讀和介紹。在這種背景下，讀一讀阿赫默德這篇文章會是很有啟發的，同樣是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為甚麼我們就不能提出像那樣義正辭嚴的詰問，相反卻對之趨之若鶩呢？”²⁰

其實，我們只要關注到香港文學這樣一個中國文學的特殊文本，那麼我們就會對傑姆遜的“民族寓言”產生疑問。香港是一個英國殖民統治地區，但我們在這裏既看不到傑姆遜所說的作為“民族寓言”語境的“文化革命”，也幾乎讀不到任何具有“民族寓言”意味的文本。

（一）

香港文學對於殖民地的境遇並不敏感。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是，雖然香港是洋人統治的殖民地，但早期香港文學中涉外題材的小說並不多見，更難看到反抗殖民性、與西方帝國主義“生

17 威·薩·毛姆：《彩色的面紗》，劉憲之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179頁。

18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Autumn 1986).

19 Aijaz Ahmad,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Social Text* 17 (Spring 1987).

20 羅鋼、劉象愚主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總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另注：傑姆遜此文的譯出並非在九十年代初，早在1989年張京媛就譯出了此文，刊載於該年《當代電影》第6期上，名為“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